[读史札记]

嘉庆猝死与道光继位之真相

白 杰　张 萍

关于嘉庆猝死、道光继位的问题，清实录与非官方的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真相颇不明朗。

据实录所载，嘉从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热河，圣躬不豫。诣城隍庙拈香。诣永佑寺行礼。”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亲玉旻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朝夕待侧。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时分，突然“上疾大渐”，以致于“戌刻，上崩于避署山庄行殿寝宫。”在嘉庆帝“向夕”“大渐”与“戌刻”“山崩”之间，《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都同样地这样写道：

“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那木多布齐，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薄、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镝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①

然而《清宣宗实录》所不同于《清仁宗实录》的是它多出了这样一条记载：七月二十九（仁宗崩后第四天）新君绵宁收到了孝和皇太后从北京驰寄来的一道懿旨，曰：

“我大行皇帝仰承神器，府育寰区，至圣至仁，忧勤惕厉，于兹二十有五年矣。本年举行秋狝典，驻跸避暑山庄，突于二十五日戌刻龙驭上宾。惊闻之下，悲恸抢呼，攀号莫及。泣思大行皇帝御极以来，兢兢业业，无日不以天下国家为念。今哀遭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视随行在，自当上应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猝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②

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嘉庆帝死前就已当众宣布传位遗诏，而且实录中有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③等语，太后又何故史无前例地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继位，并懿旨中有“但恐仓悴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之语呢？《清宣宗实录》与《清仁宗实录》此处的矛盾与出入，令人起疑。

最早述及嘉庆驾崩与道光继位的非官方史料，即包世臣为他老师军机大臣戴均元所作的墓志铭，文中载道：

“七月，公偕满相托文恪公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事。最后近待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④

包氏碑文成于《清宣宗实录》之前、道光在位之际，它的记载与实录相左。这样，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清人李恒在编写《国朝耆献类征》时，最先收录了包氏的记载，该书初编卷三十六、宰辅三十六“戴均元”节下，全文征引了戴均元墓铭。⑤足见，包氏碑文是李恒所见有关戴均元的权威之作。这说明，碑文中关于嘉庆猝死、道光继位的说法被当时人所接受，并作为信史加以

引用。此后，清人陈康祺在他的《郎潜纪闻（二笔）》第十卷中，也是依据了包世臣的记载，作有《托戴二相之镇定》一节：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满相托文定公津、汉相大庾戴公均元，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二公督内臣检御箧十数事。最后，近待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定坏金锁，发盒得宝书，遂相偕奉宣宗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行礼，乃发丧，中外晏然。服二相之镇定。”

作者还在文后的“敬按”中明确指出：“是则本包世臣大庾神道碑，与实录所纪销异。”⑥陈康祺于此指明了两种记载的差异，并在两者之中，选择了包氏的说法。

本世纪初，孟森先生在编写《明清史讲义》时，对于道光继位的阐论，也是以包氏碑文为依据，并对这条史料的可信度作了论证：

“世臣童试时即受均元知，均元历官中外，世臣从游数十年，得之口授；不应无据。且墓碑传拓行世，方当宣宗在御之事，岂能以无据之言，诬襲官寝，将不为戴及已身家计乎？然则语必可信。”⑦

这里，孟森先生凭借着他对这条史料的坚信，而以此孤证作为依据加以阐述。尽管他在撰写《明清史讲义》时曾大量地引用实录，但于此处他完全抛开了实录。而他在此不信实录的同时，却并未指出实录之中的自相矛盾与暧昧曲笔。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成果，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似可归纳为四种情况：

其一，完全依据清官书所记来阐述嘉庆之死与道光即位。如冯士钵、于伯铭两先生所著之《道光传》。

其二，基本沿袭孟森先生的说法，如《清代全史》。作者引用了《郎潜纪闻》，并注明了它的本源——戴均元墓志铭。书中在利用太后懿旨这条史料时，并未指明懿旨的可疑特别是它与实录关于崩前宣谕的自相矛盾。

其三，不据包世臣墓志铭、孟森先生观点，（这或许是由于作者没有看到，或许看到了而未予重视），另辟蹊径，且有所获的，如潘振平先生在《清代皇帝传略》中撰写《道光帝旻宁》时，即为我们引出了另一条重要史料——《清史稿·禧恩传》的有关记载：

“二十五年，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功，当继位。权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命在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上行走。”⑧

潘先生认为太后懿旨值得疑问，并利用这条史料，得出了“关于嘉庆帝死后才将传位朱谕启封的说法似更可信一些”的结论。⑨

其四，提出了《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的抵触，但尚未作出进一步阐述，如赵云田先生在他的通俗史作《明清宫庭秘史》中，提出了一个个令他感到“奇怪”的问题，从而推断：“嘉庆帝的死和道光帝的即位，有许多情况令人起疑。”⑩

总之，嘉庆猝死、道光即位真相如何，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嘉庆从“不豫”到驾崩，仅在48小时、甚至40小时之内，而其从“大渐”到驾崩，仅在三、四个小时之内。这一点无论是实录，还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所说的“变出仓猝”、“事出仓猝”，都毫无置疑地证明了嘉庆帝是猝死而亡。故老传闻中有关他被雷电劈死之说，虽无从证实，似乎也印证了突发性这一特点。

与嘉庆帝一生的身体“素健”相比，他的死实在来得过于突然，实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

内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于死后梓宫还尚“无合制良材”。足见，嘉庆帝并未料想过身后，而突然的暴逝也没有给予他从容述写遗诏的时间，这一点道光帝本人也承认所谓“遗诏”为枢臣代拟；而且从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的相互佐证来看，嘉庆帝甚至连传位密诏所放何处都未及交待。

与嘉庆帝以前的诸帝相比，顺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将部分遗诏内容过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遗诏是在辞世五年前就已拟好基本内容，而乾隆帝更有训政三年的时间来从容考虑他的遗诏，及至嘉庆帝遗诏，纯属军机大臣代笔，这一点实录亦毫不讳言，从而也给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谓“遗诏风波”。关于秘密立储的传位诏，雍正帝在创立此制度后，将密诏一式两份，一份暗存自己身边，一份明存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他死后，两份密诏先后找到启封。嘉庆帝本人得以继统的传位诏是由众臣恭取于正大光明匾后，由乾隆帝亲自主持宣示的。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密写传位诏书，立皇二子绵宁为皇太子。但这份密诏似从未置于正大光明匾后，而是二十余年随身携带。⑪嘉庆帝本人对传位诏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没有想到的是会不及交待而猝然辞世。

正因为先帝没有交待后事，特别是传位诏书放在何处，影响了新君的迅速入统，造成了皇位的一时真空，所以“从官多皇遽失措”。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内臣检御箧十数事”，⑫仍无所收获。

时间很快进入了七月二十六日。扈跸亲贵重臣一方面派人驰报京师，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举措。《清宣宗实录》上记载有：二十六日“命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及“是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⑬这一则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则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继位诏的情况，要求在大内及圆明园里找寻传位诏。

同时，国不可一日无君。亲贵重臣也正为暂时的皇位空虚召开了紧急会议。睿亲王淳颖之子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功，当继位。”⑭尽管以前有种种迹象表明绵宁极有可能就是嘉庆帝生前嘱意的继承人，禧恩的“建议”不无道理，而且他指出了绵宁的重要功绩，即嘉庆十八年九月的紫禁城定乱之功。但在没有找到足以作为法律依据的传位密诏以前，多数大臣未与妄加推断，作为中枢臣首的托津、戴均元更显得镇定与谨慎。史载“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⑮

这时，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名内侍从身上取出一个上锁的小金盒，没有钥匙。托津上前用力拧断金锁，当众打开金盒，里面正是嘉庆帝密书于嘉庆四年的传位诏书。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托津、戴均元、禧恩等“奉今上即大位”，“随瑞邸成礼”。⑯这也正《清史稿·禧恩传》上所载的“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传位密诏的发现，使绵宁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新君，消除了承德诸臣由于皇位空虚而产生的“皇遽”。七月二十七日，绵宁的新君身分“谕内阁，朕继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同时，“又谕：著派吉论泰带领太监二名驰驿回京至圆明园。著苏楞额、阿克当阿传知总管太监，奏明皇太后。令吉伦泰面叩请安。”⑰这是承德方面第二次派人“驰驿回京”，这次显然是告知北京，传位诏已找到，绵宁已顺利承统。而从时间上计算，此时的北京刚刚收到来自承德的第一份驰报，开始于大内和圆明园里查寻密诏。经过一天的紧张查寻，在京的大臣们一无所获。孝和皇太后此时果断地决断，认定并非已出的皇二子绵宁就是先帝的继承人，并为此专门以懿旨的形式令留京王大臣飞速驰寄承德的绵宁，令其“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清宣宗实录》记载了这份懿旨到达承德的时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八日的一天也正是懿旨由北京到承德的路上时间。尽管绵宁接到懿旨时，已经顺利继统，但他对"母后"在关键的继统问题上给与自己的支持感到由衷地感激。正所谓"恩慈深厚，子臣伏地叩头，感悚不能言谕。"⑱实录在记载绵宁的这份"恭折复奏"时，是以"维时"二字将从嘉庆猝死到道光即位的这段时间进行了模糊化的曲笔。

综上所述，结论是嘉庆帝猝死无疑，道光帝的入统有惊无险。清实录关于喜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纯属虚构。戴均元墓志铭、与《清史稿·禧恩传》（其根源还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相互佐证，可以为信，并与实录中关于太后懿旨的记载吻合起来，为我们揭示出了嘉庆猝死、道光即位的真相。

从此后的历史看，无论是道光帝本人的始终对孝和皇太后的崇敬与诚孝，还是托津、戴均元皆因"敬拟遗诏""内有错误"⑲而被逐出军机处，以及禧恩的平步青云，都无不与嘉庆猝死、道光即位这四天的历史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搞清这一问题，不仅是认清历史事实本身，更有助于理解道光初政，特别是遗诏风波引起的枢臣班子大调整的政潮。

---

①《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四，中华书局版《清实录》（三二）第 937 页；《清宣宗实录》卷一，《清实录》（三三）第 79—80 页。

②⑱《清宣宗实录》卷一，《清实录》（三三）第 84 页。

③⑬⑰《清宣宗实录》卷一，同上书第 81 页。

④⑫⑯《清代碑传全集》下卷二，第 802 页。

⑤李恒：《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十六、宰辅三十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年版，第 5 册、第 139—142 页。

⑥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中华书局 1984 年版《郎潜纪闻二笔三笔》下册、第 506 页。

⑦⑪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 613 页。

⑧⑭⑮《清史稿》三八传，卷 365，列传 152，第 11436 页。

⑨左步青主编：《清代皇帝传略》第 267 页。

⑩赵云田：《明清宫庭秘史》第 126 页。

⑲《清宣宗实录》卷四，参见《清实录》（三三）第 118—120 页及第 122 页。